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3-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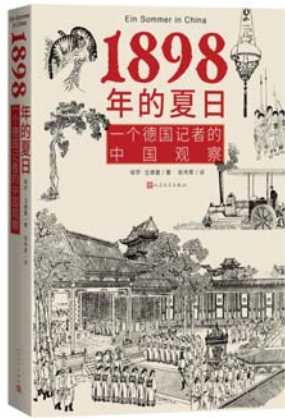
齐鲁晚报

2022年4月16日
星期六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曲鹏

19世纪末,德国《法兰克福时报》记者保罗·戈德曼的中国之行,记录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,也给人留下了李鸿章、张之洞、荣禄、谭钟麟、蔡钧、王存善等人物的时代剪影。百余年后,戈德曼当时留下的文字被重新发现,翻译,以《1898年的夏日: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》为题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。一个德国记者对清末官场和社会的观察,总不免带有一些偏见,但换个角度看,他的观察和分析也多有独到之处,常常是中国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视无睹的。戈德曼的游历和采访,展示了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些原始样态,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。

□海美



《1898年的夏日：
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》
[德]保罗·戈德曼 著
吴伟栗 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古董店里淘出宝

《1898年的夏日》原始德文版图书的发现者是旅居德国的华侨吴伟栗。他在欧洲学习、生活多年,每到一座城市都喜欢去看古董店和邮票店。徒步古老的街道寻觅历史痕迹,是他在外旅行的最大爱好。

2011年的初秋,吴伟栗第一次前往地中海的亚得里亚海岸,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引起了他的兴趣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,保留着很多原始印记。吴伟栗沿着古老的街道漫步前行,来到一家古董店前。在那里,他意外发现了一本德文名译作《一个夏天在中国》的旧书,里面全是古典字体的德文。回到法兰克福后,他立即把书拿去请人翻译,发现这是德国记者保罗·戈德曼对1898年中国社会的描述。

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。一场戊戌变法震动全国,至今仍是史学热门话题。这年3月6日,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《胶澳租借条约》,德国通过该条约租借胶澳(即胶州湾)及其周边地区,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。4月10日,戈德曼受《法兰克福报》指派,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,对中国进行采访。

保罗·戈德曼,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(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),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。他是奥地利、德国新闻工作者,也是旅行作家、戏剧评论家、小型戏剧作者。戈德曼父亲是当地的商人,母亲是家庭主妇。他在德国布雷斯劳大学法律专业毕业,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后前往维也纳,在他叔叔马姆斯罗斯主持的《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》杂志工作。

1892年至1902年,戈德曼在布鲁塞尔、巴黎和中国担任《法兰克福日报》的记者。1896年,由于“德雷福斯事件”,他与法国犹太新闻记者卢西恩·米勒瓦之间发生了一场手枪决斗,最后以放弃告终。

从1902年开始,戈德曼在维也纳、柏林担任《维也纳新自由报》的戏剧记者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担任了战地通讯员。

戈德曼因反纳粹而命运多舛。据吴伟栗考证,戈德曼是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、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的密友,希特勒最怕的人物就是兴登堡,年老的兴登堡去世以后,希特勒走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。戈德曼是反对纳粹的,他选择出走米兰投奔女儿躲避,奥地利秘密警察局于1933年8月把他从米兰抓了回来,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不满。

戈德曼的身份特殊。他从1916年起出任德国外国记者协会主席,他也是该协会的创始人。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,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各国记者协会,分别致信纳粹政权,要求公正对待戈德曼。在多方强大的压力下,纳粹政权3天后释放了戈德曼。出狱后,他被遣返至维也纳。1935年9月25日,他在维也纳去世,享年70岁,葬于维也纳城市公墓。

吴伟栗费尽心力查到戈德曼的资料,并在维也纳找到了他的故居,同时在维也纳公墓管理处,找到了戈德曼墓地的编号。遗憾的是,由于墓地费用仅支付到1994年6月5日,此后无人前来缴费,墓地管理部门无法联系上其后人,只能按惯例给予20年的延期。2014年6月5

一位德国记者眼中的晚清

《1898年的夏日》：

日,该墓作为无主墓处理,现在墓碑已经不存在了。

曾被纳粹列为禁书

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,西方媒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派出大量记者来到中国,戈德曼就是其中之一。此行,他专程对大清帝国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司法、出版、宗教等进行考察。

1898年4月,他从意大利北部热亚那港口出发,乘坐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,由地中海经埃及萨德港、苏伊士运河、红海、亚丁湾,远航至新加坡。此后,他从香港登陆中国大陆,经广州、上海深入中国腹地。

整个夏天,他先后拜会了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、上海市市长、两个通商城市的地方要员。他沿长江乘船而下,在汉口、武昌、镇江等城市都有所停留,对中国铁路建设中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有所了解。他在武昌考察了德国军官训练营,结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,记录了德国工程师与军事教官在中国工作的全过程。

随后,他又前往胶州湾的青岛、威海、芝罘(即烟台),探访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。接着,他从芝罘继续北上到达天津,访问、参观了天津武备学堂。此时,北京发生了戊戌变法,他被困天津多日。待北京戒严解除,才得以进入北京城采访。

戈德曼的运气不错,此

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大人物颇多。在芝罘,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,这是一位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。在天津,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、直隶总督荣禄。在北京,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。

返程之后,戈德曼将自己的中国见闻整理出来,原著于1899年在德国出版发行后,1900年很快发行了第二版。戈德曼为了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,在再版时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做了一些注解。吴伟栗买到的正是第二版,所以,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本书的全貌。

因为作者反对纳粹,这本书在德国曾经被列为禁书,纳粹时期要求全部销毁,图书存世并不多。吴伟栗希望将这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图书重新出版,所以马上与德国版权管理机构联系,他们很快给了书面答复:该书已经过了70年解禁期,可以申请获得再版的权利。由于原书是古典字体德语,普通人阅读困难,于是,吴伟栗委托专业人士用了一年时间,将古典德文逐字转换成现代德文,并于2014年在德语国家出版。时隔数年后,这本书的中译版终于与国人见面。

独爱芝罘的海湾

作为记者,戈德曼观察细致。他把握住来之不易的机会,从方方面面记录中国。仅是一座北京城,他就写了2.5万字。

他从火车开始写起,写到皇城,写到田野、坟墓、平原的景观,写到城市里生活的人,以及大清帝都城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的皇权气派:“火车的其他车厢里都塞满了中国人,有些人穿着胸前绣有四方图案的华丽长袍。所有这些人头上都戴着前方有直立帽檐的黑色冬帽。因为几周前皇帝下了一道换穿冬季服饰的诏命,于是整个帝国,无论什么气候,由极北到热带南方,从皇帝喜欢的那一天起,都开始进入冬季。在北京的圣上一旦发现,洁净的北风吹抚过他高贵的鼻尖,那么他的四亿臣民也会同样感到寒冷,需要躲进温暖的长衣里。南方的住民,例如广东一带,即使仍在夏季,也必须换穿冬季服饰,因为皇上觉得冷了。夏天何时开始,也会以同样的方式,通过皇帝的诏命来认定。”

让人有些意外的是,戈德曼走访了那么多城市,似乎对山东半岛的芝罘印象尤佳。用他的话说:“在平淡无奇而生活单调的中国,芝罘算是一个令人十分喜爱的地方。”

在他笔下,芝罘的风景不像青岛那样开阔自由,因此山和海之间的所有建筑全都拥挤在一起。不过这份拥挤却不显得拘束或沉闷,因为山之外是无边无际的海洋。夏日里,芝罘海湾的海水时不时呈现一片蔚蓝,像极了意大利的海水。特别是芝罘对面对有山驻足的海滨,形成了一个深蓝色的海水区。山脚下的村庄在他看来很像意大利的卡普里岛。

戈德曼很喜欢这里的环境。“一般说来,芝罘的海湾很平静,平日里



海面看起来也很平滑,有的时候会有稍许的移动。这里的空气干净极了,阳光普照。每当快到黄昏,西边天空就会出现美丽至极的色彩变换,云朵全部变成了玫瑰色泽,一道天空蓝则会从云朵中清晰照射出来,阳光这时呈现着灿烂的金黄色。就在太阳西沉的地方,水和天空形成了一片明亮的光影。在海面上行驶的船只就停留在这片金黄色当中,像极了法国画家克劳德·洛兰在他画中所幻想的那个华丽的风景。”

他还对当地的葡萄酒产业有关心和研究。当初欧洲人来到芝罘后,观察到这里的气候环境适宜种植葡萄,便试着在当地酿造葡萄酒。不过,欧洲人建起来的葡萄园,最后被中国张裕酿酒公司收购了。

戈德曼对中国国产葡萄酒期待很高:“中国人非常清楚,质量好的葡萄汁价值几何,在过去几年中,他们已经习惯了喝气泡酒,不知不觉变成了专家,欧洲商人是不可能拿次级品蒙骗过关的。他们可以从口味分辨品牌,清楚地知道带有金色印记的牌子代表着什么。现在他们则想自己酿造葡萄酒。张裕酿酒公司那里有一位优秀的、为人亲切的、来自奥地利的葡萄酒专家,他曾在纽因堡修道院学习葡萄酒酿造技术。目前,他们已经种植了八公顷的葡萄,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大。葡萄在中国的烈日下茁壮成长,不久的将来想必我们就能喝到中国的香槟酒了。”

实际上,对芝罘喜爱并非只有戈德曼一个人。当时,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几乎都在河口,只有芝罘直直地连接着海洋,这也是为什么在炎炎夏日时,当地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丝清新。因此,芝罘就成了中外公认的海滨度假胜地。直到后来,离北京、天津更近的北戴河才作为竞争者出现。

读史以明志。时隔百余年后,《1898年的夏日》一书还是能带给我们许多营养和惊喜。中国与世界,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,需要历史的沟通、文化的沟通,需要消除偏见,需要相互尊重。这正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。

